



史学理论
丛书

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



SHI XUE LI LUN CONG SHU
HISTORY AND THEOR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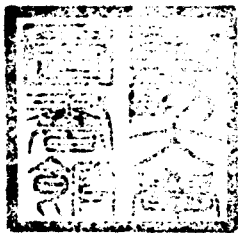


2 032 2887 2

史学理论丛书

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

《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门头沟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320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1—2700册

ISBN7—5004·0773—4/K98 定价：5.90元

《史学理论丛书》编辑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当前亟需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理论丛书》就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创办的。

本丛书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建设,贯彻双百方针,研究探讨有关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分析评介国外史学理论流派和史学发展状况,发表运用新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史学作品,推动历史学的革新,促进历史学的繁荣。

本丛书是学术性的,不定期出版。每种的形式不限,以论文为主,也有译作,也可能是单独一本专著。

深切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导和帮助,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史学理论丛书

主 编	陈启能	
副主编	于 沛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沛	刘家和	苏双碧
何兆武	陈启能	李幼蒸
李祖德	张芝联	罗凤礼
庞卓恒	蒋大椿	瞿林东

目 录

东方专制主义问题	林志纯(1)
“无组织力量”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对抗	刘修明(14)
古代罗马历史和“社会结构调节原理”	廖学盛(33)
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建设	蒋大椿(41)
必须全面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	王 新(46)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试论当代西方心智 史学所面临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田晓文(54)
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	陈启能(65)
近年美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若干特点	程 洪(80)
当代美国史学状况	罗凤礼(88)
当代英国史学一瞥	何 平(106)
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法〕安德烈·布吉耶尔 许明龙译	(123)
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美〕杰·埃利 王丽芝摘译	(138)
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陈其泰(143)
“普遍的历史观念”如何可能? ——评康德的 历史哲学	何兆武(155)
历史研究的逻辑:解释和假设的形成	李晓风(175)
科技与历史——从史学对科技的忽视谈起	吴必康(192)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及其渊源	陈祥超(209)
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法〕弗·菲雷 王 凌译	(222)
史学理论与跨学科方法论	李幼蒸(236)
关于跨文化分析的向点看法〔美〕约·布莱尔 张金言译	(240)
霍布斯鲍姆与新社会史	姜 芑(256)

险航一生 知微见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劳伦斯·斯通教授采访记.....	杨 豫(276)
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	
史学遗产初探.....	陈 彦(290)
功绩与启示:维纳尔·康策及其社会历史学思想	
.....	杨玉生(305)
吉诺维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奴隶制研究	
.....	赵世玲(316)
一部西方史学思想的演变史——《克丽奥之路	
——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评价	邝 涌(331)
社会文化史方法与英属北美殖民地史的复兴——《英属	
北美殖民地史:近代早期新史论文集》评介.....	满云龙(336)
英文目录.....	(341)

东方专制主义问题

政治学、历史学二千多年来的误解

林 志 纯

一、先秦中国——内无东方专制主义，

外亦未闻东方专制主义，不知

东方专制主义为何物

专制主义(Despotism)是近代政治学、历史学外来语的译名，溯源于西方古典时日，是古希腊文 δεσποτεια 之意译，意即“专制”或“专制统治”(Absolute rule)。

这种专制统治主要是指君主专制或专制君主政治(Autocratic Monarchy)。同语根之希腊文 δεσποτης，其第一意义是“主人”(Master)，在这里则指“专制”君主(Despot)。

以汉文“专制”译西文(Despotism 英, Despotisme 法, Despotie 德)，不知始于何时，早自清季严〔复〕译之《孟德斯鸠法意》，晚至解放前出版之黑格尔《历史哲学》，盖久已通行。

可是，在古代中国，见于文献的“专制”或“颛制”，少得很，而且更多更主要地适用于人臣，而非用之于君后。郭沫若曾云“专字金文未见”，卜辞有专字三例”(《金文丛考》“释惠”)。今知甲骨文有“专”有“制”，但尚无“专制”连用之例”(《甲骨文编》，《殷墟人辞综类》)；金文“专”字有补者”(《金文诂林》补，册七)，亦未见“专制”。

古籍中“专制”连用者，如《国语·楚语》上，武个“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左传》(昭公十九年)，“晋大夫而专制其位”；《管子·立政》，“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合，罪死不赦”；《韩非子·亡征》，“婴儿为君，大臣专制”；“任官太尊，专制擅命”；《韩非子·南面》，人臣“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韩非子·难一》，主无术，“一用则专制而劫弑”。先秦典籍中有“专制”者寥寥可数，秦汉帝国时代追记先秦

“专制”者，如《史记 穰侯列传》，“范雎言宣太后专制”；《淮南子·道应训》，“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宋〕子罕也”；《淮南子·汜论训》，“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其事属秦汉帝国时代，非追叙先秦者不举。

人臣专制，不过专权而已。古籍中有单用“专”字，其义已可充分说明专权者，如《左传》桓公十五年，“郑祭促专”；襄公十九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襄公二十七年，“卫宁喜专”；《礼记·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示民不敢专也”；《孟子·公孙丑》上，“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孟子告子》下，葵丘之会，“四合曰，无专杀大夫”，等等。这种专权的“专”，是“专政”，即“狄克推多”或“独裁官”(Dictator)之“专”，不是“专制”，和“专制”不属一个概念，尤其不是“君主专制”，不是近代政治学意义的“君主专制”。

《孟德斯鸠法意》云，“专制者，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又云，“夫专制者，以一人而具无限之权力，惟所欲为，莫与忤者也”(1981年版，“严译名著丛刊”，页11,24)。这种专制君主的权力是着重在政治方面的，在古代中国，要到秦王政统一天下，称始皇帝之年(即公元前221年)，才开始有，在这之前，二帝三王之世，不论是仁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也不论是暴君，如桀纣幽厉，都不能说是专制君主。

为什么？

古典时代的国家，在帝国(秦汉帝国，希腊化帝国，罗马帝国)出现之前，其形式是邦(πολις)，或云城邦(city-state)，一个个的邦，作为城邦联盟(συνμαχία)成员的邦，而不是帝国。二帝三王之邦只是邦之联盟的盟主之邦，王朝不是帝国，二帝三王虽为天子，不是秦始皇那样的皇帝，他们不是专制君主。

二帝三王这样的王朝天子，在本邦是邦君，可以管辖本邦的邦人，即国人，邦之自由民公民；他无权管辖别的邦的公民，别的邦的邦人属于列国之邦或邦君，不属于天子。秦始皇这样的皇帝就不同了，他命令天下民曰黔首，邦没有了，邦君没有了，他是专制帝国的专制君主了。帝国领土不是邦畿千里，而是三十六郡(或四十郡)那样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或行省制。

邦君，或作为邦之联盟的盟主的天子，传统都具有双重权力：血缘关系的来自氏族部落传统的宗教权，以及政治军事关系的来自邦和联盟的政治权，二者即传统常见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命属于前者，对

邦人和邦国以及联盟的管辖指挥权属于后者。王朝天子握有这两种权力时叫“天下有道”；他的政治权旁落，但还能握有其另一种权，即宗教权，尚有一天命在的时候（“天命未改”），叫“天下无道”，这时政治军事权落到霸主之手了。如果连后一种权力，名义上的权力，宗教上的公认权力，也没有了，这个王朝便亡了，天下便亡了。

这样的邦君，这样的天子，历史上排列不到专制君主的地位。他有一天命在手，例如敢于拒绝晋文公请隧的周襄王（《左传》信公二十五年），敢于拒绝楚庄王问鼎的周定王（《左传》宣公三年），能算是专制君主吗？他们没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在霸者之手。即使也有政治军事权力，而且像商纣那样，自言“我生不有命在天”（《史记·殷本纪》），他能算是专制君主吗？他本质上还是邦之联盟的首领，殷天下还是诸邦林立而且与之对立的周天下也一样。历史没有走出城邦和城邦联盟的阶段，没有到达专制帝国的时期。正因为这样，要从先秦时日文献中直接找出道及君主专制的材料是很不容易的。

专制主义或君主专制是历史学范畴的概念。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专制主义。氏族社会没有专制主义。文明初期最早出现的国家不是专制主义国家。穿插在城邦政治发展过程的各种独裁形式，如梭伦改革中采用的“调停人”（*διαλλακτης*）形式的政治活动，如希腊古典各邦各式各样的僭主政治（*τυραννις*），以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各种狄克推多专政，都不是君主专制或专制君主。总之，先秦中国，内部没有出现专制主义帝国阶段的国家。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不仅在本国看不到专制主义帝国阶段的国家，同时，在邻邦、邻近地区也没有机会看到先进于专制主义帝国阶段的国家。当时的中国人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邦和邦的联盟天下；他们放眼周围世界见到的则是各式各样的兄弟民族，所谓蛮夷戎狄。

古代中国华夏民族，由于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发生较早，比之周围兄弟民族先进于文明。直到春秋时代，早已迁入中原黄河流域的戎人，还有“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之说（《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晋魏绛和戎之时，犹言“戎狄荐居（逐水早而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土地可以买卖）（《左传》襄公四年，公元前569年），即是说，这些兄弟民族尚未定居，尚未从事耕稼。到了战国初年，孟子（约前372—前289）犹言，“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饗飧，无百官有司”（《孟子·告子》下），即尚未进入城邦阶

段。外于文明时代但仍在城邦阶段、城邦联盟阶段的华夏民族，是在经济文化发展不等的兄弟民族包围之中。古代中国文明，当先秦时代，与古代西亚文明先进地区，中间有所间隔。在考古研究未有新发现之前，我们还得承认，古代中国与古代西亚，当初尚未有直接往来，公元前8—7世纪亚述帝国的全盛（前744—前612），公元前6世纪中叶居鲁士之建立波斯帝国，以及随后这个帝国之征服全部西亚和埃及，这一切国际间大事，当时中国不可能有所闻知，这些大帝国当时的专制主义统治，中国古代各族居民当时当然也无所知晓。

自己还没有专制主义，也不知道别人已有过的专制主义，古代中国，当先秦时代，因之有自己发展的比较纯粹的邦或城邦社会的文化和历史，有比较单纯的前文明和初始时期兄弟民族社会的文化和历史（Cultures and histories of Pre—and Proto—civilized societies of our Minorities in ancient China）。而这些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传留于今的我国古典文明文化和科学的遗产。如果谁要研究人类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史，要研究城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那就应该从先秦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入手，因为这里有十分丰富的传留于世的物质资料和文献，没有受过帝国阶段的思想家、历史家的影响，从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到韩非子，大家无所拘束，百家争鸣，自由发言，有后世所得不到的思想解放的境界。当然，这里说的“解放”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因为大家都不免受到“天命”论的时代局限性的束缚，思想如此，行动也是如此。

但是，对于专制主义，尤其东方专制主义，先秦中国传世的典籍是未受干扰的，不应发生什么误解的，是不知道的，因而不受影响的。只这一事，古典中国典籍难道不使人感到更加可贵吗？

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先秦文物后来不被专制帝国的政治学、历史学侵犯了！秦汉帝国以来，直至近代，二千多年来，哪一代的文人学士、政客官僚，不曾利用古典文化为自己服务！通过这些人的不断解释和不断歪曲，中国古典文物难免蒙上层层的尘埃和阴影，使当今的科学工作者多费了洗刷翻新的工夫。

请以孔子为例。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论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学著作，比希腊人柏拉图的《理想国》早约一个半世纪，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早约两个世纪。然而时至今日，世之言政治科学者，皆溯源于希腊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论中国古之封建专制者，往往追踪于孔子及孔氏之学！此盲目之说也！孔子生当城邦阶段的古典中国，何能有封建专

制之思想？先秦孔氏遗书，不倡忠君。“为人谋而不忠乎？”为国人谋忠于国人，朝朝自省，无条件之忠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有君臣关系之忠，有条件之忠也。《礼记·大学》篇，引《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属于邦，犹古希腊人所谓公民乃城邦动物。”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不倡忠君也。孔门师徒以“仁”为教育中心，仁者，天子之事，邦君之事，非一般人（小人、庶民）之事（故“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教弟子为人（为仁），其最终标准，教之为君，为天子，“雍也可使南面”是也。其答颜子之问仁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归仁者，为尧舜之君，行文武之道，为君为天子也（居陋巷之颜回，如只讲个人生活，非礼勿视听言动，何能“天下归仁”？）。《史记·孔子世家》记鲁之公出弗扰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描写孔子当时“欲往”之态度云：“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犹庶几乎？”共三十三字，自汉之桓谭至今日之注释家，皆以司马迁为诬蔑孔子，不知此出于“古论”（《论语》古本，出自孔壁），唯太史公有此胆识，敢录之以传世。孔子第八代孙孔甲，参加农民起义。为陈涉博士，与之俱死，受孔子之家教也。

自秦汉帝国以下，先秦著作，先秦哲人思想，二千多年来，不断被后世误解，孔子及孔门《论语》，作为世界最早的一部政治学教科书，几经专制帝国倡愚忠愚孝者之改头换面，书犹在也，学说全非矣！

今日言东方专制主义者，必有古中国，言中国专制主义者，必有儒家忠君思想，言儒家学说者，必自孔子始，自先秦孔门《论语》始，二千多年来积累之误解，不仅遗毒国人，抑亦播毒西方！故论“东方专制主义”问题，必自先秦中国始，此时古中国无专制主义，先秦中国之“专制”皆后世无知者之误解也！

二、古希腊人——内无东方专制主义，

外已接触异邦专制主义，开始

对东方民族发生误解

西方也一样，古典时代希腊人内部亦不讲专制主义或专制统治（δεσποτεια），他们自己没有专制君主（δεσποτης），不知君主专制为何物。古典时代希腊人亦处于城邦阶段。

在柏拉图对话《巴曼尼得斯》篇（133D—E）有如下的一段：

“Οιον,” φαναι τον Παρμενιδην, “ελ τλς ημων του δεσποτης η δουλως εσταν, ουκ αυτου δεσποτου δη που, ο εστι δεσποτης, εκεινου δουλως εστιν, ουδε αυτου δουλου, ο εστι δουλως ο δεσποτης, αλλ ανθρωπος ων ανθρωπου αμφοτερα ταυτα εστιν αυτη δουλειας εστιν ο εστι, και δουλεια ωσαυτως αυτη δουλεια αυτης δεσποτειας,”

“巴曼尼得斯说,譬如我们中一个人是某个人或奴隶,那么他就不是主人自身的奴隶,而主人也不是奴隶自身的主人;但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主人或奴隶。反之,主人身分自身是奴隶制自身的主人身分,而奴隶制自身则是主人身分自身奴隶制,我们的奴隶和主人与他们无关,而他们也无关於我们。”①

这里,不论是主人(δεσποτης)还是主人身分(δεσποτεια),希腊文原文同“专制君主”或“专制主义”(专制统治)都是一个字,但都不能说是“专制君主”(despot, absolute ruler)或“专制主义”(专制统治)(despotism, or absoluterule)。这是对希腊人说的。古希腊人自己有奴隶主,但无专制君主。

对波斯帝国则不一样,希腊人认为那是“蛮人”(非希腊人)“专制统治”(δεσποτεια βαρβαρικη)的国家,如柏拉图《法律论》(Book III, 693)中所作的结语,这个帝国当前的虐政,正是由于极度的奴隶制和专制统治(σφοδρα δουλειαν τε γαι δεσποτειαν)。

古希腊人内部不知道专制和专制主义,这和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学知识有相一致的水平;而古希腊人外部见到专制主义的帝国,例如波斯帝国,乃至亚述帝国,在这方面他们的见识比之古中国人要广些。但与此同时,古希腊人因此易于发生种种偏见,不能正确认识城邦和帝国的历史发展相关的过程,不能正确理解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的政治形式上民主和专制等等差异而同时并见的原由。

公元前 521 年,古波斯史上有过大流士等七人夺取政权之后,集会讨论波斯这个国家以后该采取什么政治形式的问题。据希罗多德《历史》(III 80—83)记载,他们是在民主政治(δημος)、寡头统治(ολιγαρχια)以及君主政治(μοναρχια)三种形式中选择一种。经过讨论,由于大流士主张君主制,

① 参照 PLATO VI(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53 版,页 223—225,希腊原文和英译及陈康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商务,1946 版,页 59、61。

七人中四人赞成，便决定波斯实行君主制。

希罗多德《历史》这段记载的事实是否可信？在波斯帝国，在居鲁士（前 559—前 530）、刚比西（前 530—前 522）两代早已实行专制君主政治之后，大流士等人以武力夺得政权，还在讨论采用什么政治形式，是民主，是寡头，还是君主专制，这是可能的吗？但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Ⅲ 80 和 VI 43）中曾经两度说明此事，他一则说这次“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在某些希腊人看起来是不可信的，但毫无疑问，这些意见是发表了，特别重要的在于会上有人主张采用民主政治，“使全体波斯人参加管理国家”；再则（《历史》Ⅲ 80 大概先已发表，后来在 VI 43 重提此事）说，“当（波斯将领）玛尔多纽斯沿着（小）亚细亚海岸航行到爱奥尼亚的时候，”他“废黜了所有爱奥尼亚的（希腊各邦）僭主，而在他们的城邦中建立起民主政治”，希罗多德写道，“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是为了使不相信（他先前记载的）七人当中欧塔涅斯曾宣布说波斯最好的统治形式应当是民主政体的那些希腊人大吃一惊”。可见当时是有许多希腊人不相信东方的波斯人中居然也会有人主张采用民主制的了！

大概，古希腊人对于东方（非希腊人，蛮人，βαρβαρος）的政治制度，对东方人政治思想的看法，以波斯人（米底人、波斯人）为例，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家的见解，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知道东方人有从部落和部落联盟到国家兴起的过程，有过从城邦和城邦联盟到帝国兴衰的发展过程（希罗多德《历史》I，Ⅲ，VI，VII 各卷，散见有关章节，参阅《世界上古史纲》上册，1979，页 219—229）。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一再强调有过主张波斯采用民主政治的波斯人，出现这种意见也不会是偶然的。

古希腊人对东方（非希腊人）政治的另一种见解是政治学家的观点，他们忽视波斯人等等非希腊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夸大乃至歪曲民族天性，血缘关系传统等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这种倾向。《政治学》（politics, 1252b9）写道：

ὡς ταῦτο φύσει βαρβαρον γὰρ δούλον ἐστί. “蛮人（非希腊人）和奴隶同其本性。”这样就提出了希腊人高人一等的观点，非希腊人本性是奴隶。《政治学》（1285a16）描述东方君主政治说：

παρὰ ταύτην δ' ἄλλο μοναρχίας εἶδος, οἷα παρ' ἐνοῖς εἰσι βασιλῆαι τῶν βαρβάρων. ἔχουσι δ' αὐταὶ τὴν δύναμιν πᾶσαι παρατήλησαν τυραννίδιν, εἰσι δὲ κατὰ νομοῦ καὶ πατρίαι διὰ γὰρ τὸ δουλικωτέροι εἶναι τὰ ἤθη φύσει αἱ μὲν βαρβάρων τῶν

Ελλήνων, οι δε περι την Ἀσίαν τῶν τῆν Εὐρωπῆν, υπομενοῦσι τὴν δεσποτικὴν ἀρχὴν οὐδὲν δυσχεραίνοντες. τυραννικὰ μὲν οὖν διὰ τὸ τοιοῦτον εἶναι, ἀσφαλεῖς δὲ διὰ τὸ πατρὶα καὶ κατὰ νόμον εἶναι. καὶ ἡ φυλακὴ δὲ βασιλικὴ καὶ οὐ τυραννικὴ διὰ τὴν αὐτὴν αἰτίαν. εἰ γὰρ πολῖται φυλάττουσιν ὅπλοισι τοὺς βασιλεῖς, τοὺς δὲ τυράννους ξένικον αἰ μὲν γὰρ κατὰ νόμον καὶ ἐκόντων οἱ δ' ἀκόντων ἀρχοῦσιν, ὥσθ' οἱ μὲν παρὰ τῶν πολιτῶν οἱ δ' ἐπιτοῦς πολίτας ἔχουσι τὴν γυλακὴν.

存在干蛮人(非希腊人)中的王政,是又一种的君主政体。这种君主掌握的权力和(希腊的)僭主很相似,但他们是依法统治,王位世袭。蛮人比之希腊人,亚细亚人比之欧罗巴人,更具奴隶性,他们忍受专制统治而无怨愤。因此,这种政治便具有僭主政制的性质。但由于世代嗣续,又以法律统治,它们局势稳定。同时,它们的王室侍卫也,因此与僭主的不属同一类型,这些王室是以武装公民为护卫,而僭主则依仗外邦人卫士。因为王室依法统治自愿的臣民,而僭主统治非自愿的臣民,所以王室从公民中觅取他们的侍卫,而僭主则用异邦人卫士以反对本国公民。

“蛮人(非希腊人)比之希腊人,亚洲人比之欧洲人,”由于“更具奴隶性,”所以能“忍受专制统治”,这就是古希腊人对非希腊人(蛮人)的根本看法。

希罗多德《历史》(Ⅶ 135)说过斯巴达两名贵族在波斯战争期间自愿派往波斯为以前两个被投到井里的波斯使者偿命的故事。当时这两名贵族出身的希腊人(斯巴达人)曾对波斯官员说一段话。其主旨虽然是希腊人反抗波斯侵略情绪的表现,但其中也反映了希腊人对东方人的一般看法。

当这两名斯巴达贵族来到苏撒时,波斯官员劝他们降服波斯国王,以换取一块赐予的土地,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但这两名斯巴达人回答这个波斯官员说:

“το μὲν γὰρ δούλος εἶναι ἐξεπίστευται, ἐλευθερίας δὲ οὐκ ὁκνεῖται, οὐτ' εἰ ἐστὶ γλύκυ οὐτ' εἰ μὴ. εἰ γὰρ αὐτὴς πειρησάιο, οὐκ ἂν δόρασι συμβουλευοῖς ἡμῖν περὶ αὐτῆς μάχεσθαι, ἀλλὰ καὶ πελέκεσι.”

奴隶的生活,你是很知道的,可是你没有尝过自由的味道,说不出它的甜与否。如果你懂得什么是自由,你就会劝我们不但用矛头,而且用斧头,为之奋斗了(希罗多德《历史》loeb本,页437—439)。

处于城邦阶段的斯巴达人(以及一切希腊人),果真“自由”吗?首先,他们是受城邦约束的,受天命约束的。他们为什么要被派往敌国波斯去偿命?去送死?自由在那里?同时,希腊人当初还没有进入专制帝国阶段,

他们自己还没有专制主义，当然不可能尝过专制主义的味道；他们对东方非希腊人中的专制主义，只能用奴与主的关系去看表面的现象。处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有自己的时代的、环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得古典希腊人政治学的科学性受到影响。

古希腊人不知道专制主义的历史根源，只好把专制主义归之于当时见到的东方亚洲人、非希腊人的民族本性；他们既然无法从希腊人内部寻觅当时只能在东方见到的君主专制，只好用希腊人自己曾经有过的僭主政治来同东方专制制度相比较，但并不相似，因为僭主政治实际上是城邦阶段历史的内容；他们在历史上先行于希腊化帝国，先行于罗马帝国，当然不知道西方古代历史在城邦阶段告终时，也会出现“东方”专制主义。

自己处在城邦阶段，不了解本土的东方专制主义，而又遇到正在东方发生的东方专制主义。古希腊人的政治学，包括集大成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能把各种政治制度从错杂纷乱的现象，理出有系统有秩序的一条历史线索，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希罗多德（如上文所引）单就波斯帝国政治制度作比较选择，却整理出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君主政治（专制）三大项的秩序系统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古代中国先秦的政治学，由于城邦制度发展比较单纯，讨论邦与天下（邦的联盟）的关系，王与霸的关系（均为盟主之邦），比之西方古典政治学似乎高明多了。直到李斯的老师荀子，同学韩非，古中国的政治学内容不出于城邦的范畴。古代中国政治学，诸子百家，是古典历史学、古典政治学的珍贵财富，可惜整理研究，二千多年来尚未理出一条线索来。世之论古典政治学者，但知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不知孔墨孟荀之书皆政治学著作也！

先秦中国，有古典之政治学，而无古典中国之专制主义，然而不知专制主义的先秦政治学著作，二千多年来被后来专制帝国时代思想家所误读，所曲解，不惟贻害后世中国人，且亦传播其祸毒于西方，使西方（自古典时代以来）倡自由民主者，以为只有希腊人知道自由，东方人，包括中国人，皆奴隶性也！古典希腊人倡之，近代欧西学者和之，黑格尔所谓东方只知一个人有自由之论是也。

有古代希腊人对东方人奴隶性与东方专制主义关系之误解的传统，又有秦汉帝国以下愈演愈烈地对先秦无专制主义文明和思想强加之以“专制主义”之误解的传统，近代西方人论东方政治者便有了两个立脚点以高谈阔论东方专制主义了！

近代西方人论东方专制主义者多矣,其中心理论是在古典时代提出的东方人奴隶性的基点上,再加之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武装,使“东方专制主义”成为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理论根据的化学武器,以向东方人民进攻,从心理上征服东方人,奴化东方人!

三、水力文明、水力社会、水力国家、水力专制主义等

(hydraulic civilization, hydraulic society, hydraue
ic state, hydraulic empires, ……hydraulic despotism)

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之批判

古代中国文明和最早的国家从城邦阶段开始,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统一天下,称始皇帝之时,古代中国人不知道专制主义,也没有接触到异国的专制主义;古代希腊文明和最早的国家也从城邦阶段开始,古希腊人内部也不知道专制主义,直到亚力山大东征,出现希腊化帝国之时,古希腊文明与古中国文明关于政治学科创作不同之处在于古希腊人从东方亚述、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那里看到了专制主义政治和君主专制帝国。而古中国人则未有此种机会,古希腊人不知道东方这些帝国前身也经历过城邦阶段(从苏美尔城邦开始)不知道这些帝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从何而来;当然当时的希腊人同当初的先秦中国人一样,也不知道自己所处的邦和天下的小世界终于会发展成为大帝国。影响后世较大的古典希腊政治学错误地将同时并见的城邦内部的民主政治、贵族(寡头)政治乃至君主政治同存在于希腊之外的君主专制政治平行排列,以为他们都是继氏族社会、原始部落、前文明时代来的政治制度。古希腊政治学家尤其错误地认为这种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别,不是历史地发展而来,而是天然产生的,出自民族性的不同,从而误认为希腊人自己是生来懂得自由的民族,而蛮人(或非希腊人)东方人则是天生的奴隶性,惯于受专制君主统治而不会反抗的民族!

古希腊人的政治学传统影响西方后世乃至近代。其论君主制,如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1285a—b),实混合东西方之制度为五:曰英雄史诗时代的王制,曰非希腊人(蛮人)之君主专制,曰 αὐστηρη (民选独裁者),曰斯巴达式王政,曰 παμβασιλεια(全权君主制, absolute monarchy)。《孟德斯鸠

法意》已评之矣：

“雅理斯多德之论君主也，其为说几不可以自通。彼尝为五主之分，顾其所据以立别者，非以其法制之异也，而多取末等之异，则有如其君主仁暴，与其得统之为继为篡是已。又以波斯与斯巴达为君主之国，不知波斯专制也，而斯巴达则民主也，皆显然之失矣。”

人类历史从现代人算起，不过三五万年。至旧石器晚期，而主要在新石器时代，发生了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农业革命，由狩猎采集以天然物为食的生活，转入农耕畜牧以人工培养种植之动植物为食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文明社会，出现了政治关系代替血缘关系的国家，出现了金属器时代的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经济，也出现了有文字为工具联系上下四方的文化，这就是人类的新社会或文明时代的社会，历史大约不过五千年，到这五千年末，距今两个世纪有奇，又发生了一次生产力革命，工业革命，经历了机械、电气以至晚近的电子计算机等各个发展阶段。文明时代历史很短，人类的社会生活以政治关系为单位组织起来，这便是国家。文明和国家的历史，习惯上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代和现代。在古代或古典时代，先存过没有专制主义的城邦阶段，而后有了专制统治的帝国。世界各地的古典文明史大体上都经历了城邦和帝国两阶段的国家，古代中国是这样的，古代希腊罗马也是这样的。从阶级关系说，古代史大概与奴隶占有制关系相当，中世界大概与封建社会相当，近现代史则相当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十分简单的历史发展系统不为近代“东方专制主义”论者所接受，他们另有一套文明历史发展的蓝图，认为人类历史分为西方和东方两大类：西方历史主要是欧洲（或西欧地中海周围）的历史，这里经历了通常所说的古代（或古典时代）、中世纪和近代；东方历史则自古至今只有一条线，“东方专制主义”，这里没有古代、中世纪、近代之分，这里没有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之别，这里只有上面的专制君主和下面的普遍奴隶，自古至今，一律如此。

“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是怎样发生的？据说东方是大河流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必须实行人工灌溉，因而有“水力文明”，“水力社会”，“水力国家”，“水力专制主义”等等，总而言之，由于东方有大河流，要实行人工灌溉，就要有东方专制主义。按照“东方专制主义”论者的主张，国家的发生过程便是水力灌溉所要求的一套：挖掘河渠，建造堤堰，这种成群结阵的工事，便需要有水力首领，而水力首领便是政治首领(hy-